

媒體使用與文化適應： 以大陸赴港大學生為例

程楊*、郭佳**、高鹿洋子**、薑瓊茜**、
孟超**、王藝馨**

《摘要》

香港與大陸同宗同源，由於歷史原因卻存在較大文化差異，本文基於這個有趣的現象，探討不同地區間文化適應問題，並對媒體使用與文化適應的關係，新、舊媒體對文化適應不同影響加以探討。以大陸赴港大學生為例，我們採用多階段集群抽樣法(multi-stage cluster sampling)，從隨機抽取的香港4間政府資助大學中成功回收476份問卷。通過對其中447份有效問卷的量化分析，本文探討了大陸學生對電視、報刊、互聯網三種不同的媒體使用程度與在港文化適應程度的相關性。研究發現，大陸赴港大學生使用媒體程度越高，在文化認知上，對香港生活習慣、社會制度瞭解程度就越高；同時在文化行為上，交友情況越活躍，參與文化娛樂活動越多。最後，相對報刊和互聯網等新興媒體，電視作為傳統媒體仍佔有重要作用，且與文化適應的四個面項（生活習慣瞭解程度、社會制度瞭解程度、交友情況和文化娛樂活動參與情況）均呈正面相關性。

關鍵詞：大陸大學生、文化適應、香港文化、媒體使用

* 程楊為香港中文大學博士生，E-mail：ccylove2010@gmail.com

** 其餘作者為新聞工作者。

壹、研究背景與目的

過往文獻大多在探討國家間個體或群體流動的文化適應問題，例如 Kim(1978)探討了韓國移民在芝加哥；Cuellar, Harris & Jasso(1980)研究了墨西哥移民在美國的文化轉變；Fan(1990)討論了香港移民在多倫多；Cheung(1996)探討了中國新移民家庭在美國；Ghuman(2000)調研了南亞青年在澳大利亞等。然而在中國背景下，地區間文化差異問題的研究甚少。

香港與中國大陸雖同根同源，但殖民地的身份，歷史的變遷，導致了香港文化中西合璧，與大陸文化存在差異：一個半世紀的英國殖民統治，給香港留下西方的烙印，經濟上，自由資本主義意識形態滲透到香港各階層，支配著港人的社會活動；文化宗教上，香港強調英文教育，有眾多基督教和天主教組織機構（白雲、白靜，2006）。同時，香港又傳承了濃厚的中華傳統文化，尤其是珠江三角洲的廣府文化，如港人多迷信鬼神和風水，佛、道寺廟香火旺盛；香港保留使用繁體字等等（白雲、白靜，2006）。1997年香港回歸中華人民共和國以後，兩地的往來愈發頻繁，如經貿投資、文化產業、城市管理、公共政策等方面的交流（何睦，2007）。每年大約有 50,000 人來自大陸的新居民，在 2017 年，總數預計升至 1,260,000(HKCNA,2010)，群體數量之龐大，大陸居民的文化適應問題非常值得研究。值得一提的是，香港回歸後，兩地的人才交流也越來越緊密。香港高校自 1998 年進入大陸招生，報讀人數穩定增長，2010 年招收大陸本科生約 1,400 人（賈思玉、胡娜，2010 年 9 月 4 日）。

作為「優才計劃」引入香港的大陸生，多是第一次來香港，陌生的粵語環境，港式教育方式、生活習慣和文化背景，不可避免地給他們帶來價值觀和文化身份上的沖擊。報章對這些「天之驕子」在香港的生存和適應狀況，進行過一些比較消極的報導，如〈愁錢愁工作愁身份 大陸生社會邊緣掙扎〉（林茂，2010 年 6 月 26 日），〈大陸生撰文談留港辛酸〉（星島日報，2010 年 8 月 10 日）。港校大陸生，這些原本被寄予希望的中港「橋梁」對香港生活的適應情況究竟如何，本文將以大陸赴港大學生為例，就地區間的文化差異問題進行相關研究。

對照 Graves(1967)對文化適應的定義——人們在新文化環境中態度、行為、信仰、價值觀等方面的變化過程，我們可以看到，大陸生在香港遇到的適應問題可歸為文化適應的研究範疇。該領域研究成果眾多，Berry(1980)將文化適應的方式分

為四類，整合 (integration)，同化 (assimilation)，分離 (separation) 和邊緣化 (marginalization)；Cuellar, Arnold 與 Maldonado(1995)將文化適應界定為行為、感情和認知三個水準；Ward 與 Kennedy(1999)製作了社會文化適應量表。在文化適應研究領域，學者們(DeFleur & Cho, 1957; Kim, 1977; Richmond, 1969)發現，這些研究為本文分析港校大陸生的文化適應程度提供了理論依據和研究借鑒。

瞭解港校大陸生的文化適應程度是我們研究的基礎，但本文更加關注的是影響他們文化適應程度的因素。在文化適應的過程中，人們不可避免地會出現不同程度的不適應及心理壓力或障礙(Berry, 1999)。為克服文化適應壓力，個體通常會採取解決問題、自我控制、尋求資訊支援、逃避妥協等應對策略進行自我調節（黃希庭，2006）。香港的傳媒十分發達，其提供的資訊或能滿足港校大陸生「尋求資訊支援」的需求，進而可能幫助他們適應香港文化。

學界對大眾媒體在個體適應新文化過程的作用進行了一些有成果的研究，並認為大眾傳媒是影響人們文化適應的重要因素之一(Gudykunst & Kim, 1997; Kim, 1977; Kim, Laroche & Joy, 1990; Lee & Faber, 1986; Penaloza, 1994)。一些學者認為媒體使用對文化適應有著積極作用(Kim, 1978; Lin, Peng, Kim, Kim, & LaRose, 2012; McLuhan & Fiore, 1968)。早在 1968 年，McLuhan & Fiore 提出大眾媒體的出現和新技術的發展有助於文化融合，全球化發展以及地球村的建立；李蕙蘭（2002）指出，大眾傳播媒介提供的主流社會的文化資訊，是讓遷移者能獲取移入地之生活資訊及經驗最重要的通道之一。旅居者尤其傾向於使用地主社會的大眾媒介，特別是電視，來瞭解地主社會的習俗、語言和行為方式(Doornink & Jin, 1988; Kim, 1977)；Lin, Peng, Kim, Kim, & LaRose(2012)的最新研究則指出社交網絡媒體有助於國際學生在美國的社會適應能力。然而另一些學者則質疑媒體在文化適應方面的促進作用，提出媒體可能進一步加強了人們的固定思維模式。已有的特定媒體使用習慣可能加大文化適應的困難(Keshishian, 2000; Miller, 1982, 1988)。

總體看來，關於文化適應的文獻，絕大部分學者關注的還是人際傳播對文化適應的影響，對大眾媒體使用方面的研究相對比較有限(Hwang & He, 1999)；已有文獻關於媒體使用對文化適應的影響也說法不一，對港校大陸生這一特殊群體的媒體使用與文化適應關係研究，對傳統媒體（電視、報紙、廣播）和新媒體（互聯網）的詳細比較更是缺乏。因此，本文將通過問卷調查的定量研究方法對港校大陸生的媒體使用與文化適應關係進行探索，旨在填補相關研究空缺。具體而言，本文將通過總結現有的文化適應領域的研究成果，提出港校大陸生媒體使用與文化適應關係

的研究假設；亦對問卷結果進行量化分析，以實際數據說明兩者關係；最後本文將對所得數據進行進一步深入解析，亦提出結論。

通過這次調查研究，在瞭解港校大陸生媒體使用和文化適應關係的同時，我們亦希望本文的研究能為大陸人融入香港的社會議題提供有價值的參考，同時為傳播學領域的媒體使用與文化適應課題提供案例支援。

貳、文獻綜述

一、文化

對於「文化」的涵義，至今尚無統一的定義。Taylor(1871)將文化定義為一個複雜的整體，它包括知識、信仰、道德、法律、風俗等個體作為社會成員所具有的一切能力和習慣。

當代中國學者龐樸（1988，頁 37）提出「文化結構三層次」學說。他將文化分為三個層次：物質層次、心物層次及心理層次。物質層次是最外在的層次，包括衣食住行等。心理層次是文化的深層結構，包括價值觀、審美觀念等文化中的隱性部分。心物層次介於物質層次和心理層次之間，是兩者的統一，即「物化了的心理和意識化了的物質」，包括理論、制度以及行為等。

根據研究，不同文化之間存在一定差異。Hofstede(1980, 1983, 1984, 1997)通過文化差異的實驗性研究將文化差異歸納為五個維度：（一）、個人主義/集體主義；（二）、權利距離；（三）、不確定性規避；（四）、陽剛/陰柔文化；（五）、時間取向。根據 Hofstede(2001)對世界三個地區不同國家文化維度進行排名的量表，香港和大陸的文化存在較為明顯的差異。例如，在有關個人主義和集體主義的量表中，香港文化的個人主義程度排在第三十七位，屬於個人主義較強的文化，而大陸文化個人主義程度在五十位之外，顯示出較為明顯的集體主義特徵；此外香港文化較之於大陸，其權利距離較小，且較為注重短期利益。因此，大陸和香港雖然是同一國家，卻因為歷史背景、地域、政治體制等差異形成了不同的文化。大陸的大學生赴港求學必然會面臨一定程度的文化差異問題，這也勢必導致大陸大學生赴港求學的要經歷文化適應的過程。

二、文化適應

文化適應的定義最初由 Rogler, Linton 與 Herskovits(1936, 頁 149)提出，它是指「由個體所組成，且具有不同文化的兩個群體之間，發生持續的、直接的文化接觸，導致一方或雙方原有文化模式發生變化的現象」。但是這一定義與實際的文化適應過程並沒有直接的聯繫。直至 1967 年，Graves 對於文化適應過程提出了更為具體的定義，它是指在新文化環境中態度、行為、信仰、價值觀等方面的變化過程。Berry(1980)進一步提出文化適應的二維模型，認為處於文化適應過程中的個體面臨兩個基本問題：（1）是否趨向於保持本族群的文化傳統；（2）發展與主流社會的關係是否具有價值。Birman(1994)在二維模式的基礎上繼續提出了兩個層面：（一）認同層面的文化適應；（二）行為層面的文化適應。其中，認同層面主要包括男女社會角色，態度等方面的信念；而行為層面包括不同類別的行為，言語行為、飲食、習俗等文化表達的各個方面。

綜合 Berry 的二維模型及 Birman 文化適應的兩個層面，本文將文化適應劃分為兩個大維度。（一）是與認知有關的文化適應，即對新文化的瞭解、價值觀、信仰等方面的文化適應；（二）是與行為相關的文化適應，其中包括文化參與、社交行為等個體在與新文化群體接觸過程中的文化適應。

三、文化適應群體及文化壓力

Berry(1999, 頁 217)指出，當兩個不同文化群體處於持續接觸的狀態時，其中一個群體能夠致使另一群體發生更為明顯的變化，即一方相對於另一方在交往過程中更具優勢，這便形成了「主流群體」(dominant group)和「文化適應群體」(acculturation group)。文化適應群體主要包括移民、旅居者、難民及多民族國家的少數民族（張勁梅，2008）。旅居者指在某一社會文化中短期居留的異文化群體，主要包括留學生、外交人員、旅行者、商業人士、傳教士等（陳慧、車宏生、朱敏，2003）。赴港的大陸學生屬於旅居群體，他們在香港學習生活中會歷經文化適應過程的不同階段。在這一過程中，留學生必然會出現不同程度的不適應及心理壓力或障礙，這些消極的行為和情緒是文化適應壓力的表現(Berry, 1999)。為了克服文化適應壓力，個體通常會不自覺的採取應對策略進行自我調節。應對的措施可

以分爲：解決問題、自我控制、尋求資訊支援、逃避妥協等等（黃希庭，2006）。赴港留學生在應對文化適應壓力的過程中會通過以上幾種措施克服困惑、焦慮、無助的消極情緒。而在尋求資訊支持方面，媒體使用是旅居群體獲得資訊支援最爲便捷的方式。

四、媒體使用與文化適應

日常生活中的媒體使用主要是指對大眾傳播媒介的接觸情況。大眾傳播媒介是指在資訊傳播過程中處於職業傳播者和大眾之間的媒介體，它包括報紙、雜誌、廣播、電視等傳統媒體和以互聯網爲主的新媒體，這些傳播媒介傳播資訊具有速度快、範圍廣、影響大等特點（Vivian, 2009）。媒體使用程度是指對各種大眾傳播媒介使用的頻繁程度，主要從使用時間和頻率來衡量。

在文化適應研究領域，學者們(DeFleur & Cho, 1957; Keshishian, 2000; Kim, 1977; Richmond, 1969)發現，大眾傳播媒介往往提供了主流社會的文化資訊，是讓遷移者能獲取移入地之生活資訊及經驗最重要的管道之一（李蕙蘭，2002）。Kim(1988)認爲，當個體進入一個新文化環境時，與地主社會大眾媒介的接觸程度和與當地社會成員的人際交往，是個體獲得更高程度的文化適應的兩個重要因素。作爲社會和文化的樞紐，大眾媒介能幫助旅居者減少在適應最初階段中人際交往的不確定感和焦慮感；同時通過傳遞各種地主文化的社會規範和價值，促使旅居者更好地完成文化適應的過程(Barnett & McPhail, 1980; Kim, 1988)。旅居者尤其傾向於使用地主社會的大眾媒介，特別是電視，來瞭解地主社會的習俗、語言和行爲方式(Doornink & Jin, 1988; Kim, 1977)。Miglietta與Tartaglia（2008）在檢視對移民文化適應的影響因素時發現，語言水準能幫助移民產生對地主社會的歸屬感和情感依賴，而接觸大眾媒體是提高語言水準的一個重要途徑。Hwang 與 He（1999）研究媒介使用與旅美的中國移民文化適應關係也證實，媒體使用能夠滿足被調查的中國移民的一些文化適應需求，如英語語言技能，對地主社會的資訊瞭解。Yang(2004)對 84 名在美國的中國大學生進行調查，結果顯示，他們收看美國電視臺新聞和美國新聞網站以及使用 BBS，能夠幫助他們更好地適應美國文化。而在當今的資訊化時代背景下，除了傳統媒介，新媒體也成爲研究媒體的文化適應角色的新著眼點。黃葳威（2001，2008）研究網絡對華人移民的跨文化適應影響時發現，互聯網能夠幫助在美華人移民瞭解美國訊息及與外國朋友溝通，從而提供了認識新文化的管

道。

另一方面，文化適應的需求是建立在不同文化之間存在差異這一基礎上，而接觸地主媒介會幫助個體減少原文化和新文化之間的差異(Kim, 1988; Reece & Palmgreen, 2000; Sam & Berry, 1995)，從而減少文化衝擊帶來的不適感。因此，旅居群體使用當地媒介越多，他們就越容易適應當地環境(DeFleur & Cho, 1957; Nagata, 1969; Nelly & Dafna, 2008)。Kim(1978)在調查旅美韓國移民也發現，那些更多地觀看美國電視節目的移民，比更多觀看韓國電視的移民能更好地融入美國社會；而在各種媒體類型中，資訊導向的媒體內容（如新聞）比娛樂導向的媒體更能促進個體的文化適應。相應的，當新移民通過文化適應的過程變得越來越熟悉當地的文化和語言，他們對地主媒介的需求也會越來越高(Kim, 1988)。

由以上各學者的相關研究可知，媒體使用是與個體文化適應相關的影響因素。赴港留學生在文化適應的過程中，能夠通過使用媒體克服文化適應壓力以此融入新的文化環境。

根據前人學者的文化定義和層次劃分，本研究中我們將文化具體為生活習慣和社會制度兩個取向。生活習慣主要是指衣食住行等基本物質需求，屬於文化的外在層次。社會制度反映該文化的心物層次，背景的社會結構和價值取向等精神層面。個體對文化各層次的適應，能幫助我們解釋個體是否完成了文化概念上的適應。另一方面，根據文化適應的理論研究，文化適應包括認知和行為兩個層面的發展過程，而認知主要是指對新文化的瞭解程度，行為主要分為與主流群體的社交情況和活動參與情況，其中包括通過交友以及看電影、演唱會等文化娛樂活動的參與適應當地文化。

由此，我們將文化的認知方面的文化適應分為兩小類：（一）對生活習慣的瞭解；（二）對制度習俗的瞭解。

根據以上劃分，我們提出文化適應認知層面與媒體相關的兩個假設：

假設一：大陸赴香港大學生使用香港媒體程度越高，越瞭解香港生活習慣。

假設二：大陸赴香港大學生使用香港媒體程度越高，越瞭解香港的社會制度。

同樣，文化適應的行為層面根據與主流群體的社交情況和活動參與程度這兩個取向，又可得出兩個假設：

假設三：大陸赴香港大學生使用香港媒體程度越高，社交情況越活躍。

假設四：大陸赴香港大學生使用香港媒體程度越高，參與文化娛樂活動越多。

參、研究方法

一、抽樣方法

來港就讀的大陸大學生數目於近年來不斷增加（大學教育資助委員會，2010），這樣一群校園裏的少數群眾又同時擁有著當代年輕人所具有的好學奮進、樂於接受與瞭解新事物的特性。因此，我們此次的研究對象便定於這群初來香港就讀的大陸大學生。

採用多階段集群抽樣(multi-stage cluster sampling)，我們首先由香港的 8 間政府資助大學（教育局，2010）中隨機選取 4 所。由於每間大學均設有覆蓋所有在讀大陸本科生的「大陸本科生聯合會」及覆蓋所有研究生及以上學歷的「大陸學生學者聯誼會」，接下來，我們分別從這 4 所大學的兩個組織中隨機抽取各 130 名學生。最後，我們於 2010 年 11 月初至 11 月中旬期間進行了實地問卷派發。受訪者以完全自願且不記名形式參加受訪，我們小組 6 名成員執行、監督且回收問卷。成功回收 476 份問卷，其中有效問卷 447 份問卷，回收率 86%。

受訪者中，155 位為男性（34.7%），292 為女性（65.3%）。在年齡方面，受訪學生平均年齡為 22 歲，其中 31.4% 為本科生，62.3% 為研究生，6.4% 為博士生。在來港時間方面，73.4% 受訪者來港時間不足半年，只有 6% 的受訪者來港時間超過三年。

二、研究變項

（一）人口變項

本研究的人口變項包括性別、年齡、教育程度及來港時間。簡單而言，性別分為「男性」和「女性」兩個選項；年齡要求受訪者填入「實歲」；教育程度分為：1、「大學本科」；2、「研究生」；3、「博士」；4、「博士後」；來港時間則有五個選項，分別為：1、「半年以下」；2、「半年至一年」；3、「一年以上至兩年」；4、「二年以上至三年」；5、「三年以上」。此四項基本人口變項亦被當作控制變量用於迴歸分析。

（二）媒介使用

我們分別研究了電視、報紙和互聯網三種媒介對文化適應的影響。受訪者被問及最常從以下哪種媒體獲取有關香港資訊：1、電視；2、報紙；3、互聯網。受訪者回答的方式分為下列幾種：1、「從未」；2、「很少」；3、「有時」；4、「經常」。結果顯示，電視使用的頻率，（平均數 = 2.28，標準差 = .99）；報紙使用的頻率（平均數 = 2.62，標準差 = .95）；互聯網使用的頻率（平均數 = 3.55，標準差 = .72）。

（三）文化適應

為檢測受訪者對香港的文化適應，我們分別參考了 Ward & Kennedy(1999)的社會文化適應量表及 Cuellar(1995)等人的墨西哥裔美國人文化適應修正 ARSMA 量表，檢測了受訪者對香港文化的瞭解程度以及在香港的社交及文化參與情況。受訪者表達他們的符合程度，從「非常不符合」到「非常符合」。根據主成分因素分析(principal component factor analysis)及最大方差正交旋轉(varimax orthogonal rotation)的結果，我們將對香港的瞭解程度分為 1、對生活習慣的瞭解程度，及 2、對社會制度的瞭解程度；將在香港的社交及文化參與情況分為 1、社交情況，及 2、文化娛樂活動參與情況。

1、對生活習慣的瞭解程度

衡量受訪者對生活習慣的瞭解程度，我們採用五點量表：1 = 非常不符，5 = 非常符合，請受訪者對以下六個題項評分：（1）「我瞭解香港人的宗教信仰」；（2）「我瞭解香港人的思想觀念」；（3）「我瞭解香港的文化藝術」；（4）「我瞭解香港人的衣著打扮」；（5）「我瞭解香港人的飲食習慣」；（6）「我瞭解香港的居住環境」。主成分因素分析(principal component factor analysis)及最大方差正交旋轉(varimax orthogonal rotation)顯示，這六個題項均呈現一個因素（Eigenvalue = 3.83，可解釋變異量為 63.83%）。因此，將此六個題項評分數值相加，合共構成「對生活習慣的瞭解程度」變數（平均數 = 18.59，標準差 = 4.21，Cronbach's alpha = 0.89）。

2、對社會制度的瞭解程度

衡量受訪者對社會制度的瞭解程度，我們採用五點量表：1 = 非常不符，5 =

非常符合，請受訪者對以下四個題項評分：（1）「我瞭解香港的交通守則」；（2）「我瞭解香港的政治制度」；（3）「我瞭解香港的法律制度」；（4）「我瞭解香港的經濟制度」。主成分因素分析(principal component factor analysis)及最大方差正交旋轉(varimax orthogonal rotation)顯示，這四個題項均呈現一個因素 (Eigenvalue = 2.71, 可解釋變異量為 67.73%)。因此，將此四個題項評分數值相加，合共構成「對社會制度的瞭解程度」變數 (平均數 = 12.62, 標準差 = 2.87, Cronbach' s alpha = .84)。

3、交友情況

衡量受訪者的交友情況，我們採用五點量表：1 = 非常不符，5 = 非常符合，請受訪者對以下三個題項評分：（1）「我經常跟香港本地人打交道」；（2）「我有很多香港本地的朋友」；（3）「我從香港朋友那裡獲得不少幫助、支持」。主成分因素分析(principal component factor analysis)及最大方差正交旋轉(varimax orthogonal rotation)顯示，這三個題項均呈現一個因素 (Eigenvalue = 2.40, 可解釋變異量為 79.87%)。因此，將此三個題項評分數值相加，合共構成「交友情況」變數 (平均數 = 8.60, 標準差 = 2.76, Cronbach' s alpha = .87)。

4、文化娛樂活動參與情況

衡量受訪者的文化娛樂活動參與情況，我們採用五點量表：1 = 非常不符，5 = 非常符合，請受訪者對以下四個題項評分：（1）「我經常參與香港的假日活動」；（2）「我經常聽香港明星的演唱會」；（3）「我經常看香港影視劇」；（4）「我經常聽粵語歌曲」。主成分因素分析 (principal component factor analysis) 及最大方差正交旋轉 (varimax orthogonal rotation) 顯示，這四個題項均呈現一個因素 (Eigenvalue = 2.14, 可解釋變異量為 53.54%)。因此，將此四個題項評分數值相加，合共構成「文化娛樂活動參與情況」變數 (平均數 = 11.03, 標準差 = 3.41, Cronbach' s alpha = .71)。

肆、研究結果

首先我們使用皮爾森(Pearson)相關分析研究媒體使用程度和對香港生活習慣瞭解程度、社會制度瞭解程度、交友情況以及文化娛樂活動參與情況的雙變數關係。

從表一可以看出，電視使用程度($r=.26, p<.001$)、報紙使用程度($r=.15, p<.001$)

均與大陸生對香港生活習慣瞭解程度顯著相關，亦呈弱正相關；互聯網使用程度和大陸生對香港生活習慣瞭解程度並不顯著相關($r=.02, p>.05$)。

對於假設二，研究發現：電視使用程度($r=.19, p<.00$)、報紙使用程度($r=.17, p<.001$)、互聯網使用程度($r=.12, p<0.05$)均與大陸生對香港社會制度瞭解程度顯著相關，亦呈弱正相關。

對於假設三，表一顯示電視使用程度($r=.23, p<.001$)和報紙使用程度($r=.15, p<.001$)均與大陸生在香港交友情況均呈顯著相關，亦呈弱正相關。而互聯網使用程度($r=.05, p>.05$)與交友情況並無相關性。

對於假設四，電視使用程度($r=.37, p<.001$)和大陸生在香港文化娛樂活動參與情況呈顯著相關($r=.37, p<.001$)，亦呈中度正相關；報紙使用程度($r=.20, p<.001$)、互聯網使用程度($r=.19, p<.001$)均和大陸生在香港文化娛樂活動參與情況呈顯著相關，亦呈弱正相關。

表一：媒體使用程度，對香港社會制度的接受程度、生活習慣的瞭解、社會制度的瞭解、交友情況以及文化娛樂活動參與情況之相關分析

變數	1	2	3	4	5	6
1.電視 使用程度						
2.報紙 使用程度	.37***					
3.互聯網 使用程度	.05	.12*				
4.對生活習慣 瞭解程度	.26***	.15***	.02			
5.對社會制度 瞭解程度	.19***	.17***	.12*	.55***		
6.交友情況	.23***	.15***	.05	.37***	.25***	
7.文化娛樂活動 參與情況	.37***	.20***	.19***	.40***	.24***	.30***

* $p < .05$ ，** $p < .01$ ，*** $p < .001$

為進一步支持研究中的四個假設，我們採用了標準複迴歸分析。四次單獨的複迴歸分析將分別研究了媒體的使用程度是否可以預測大陸生對香港生活習慣的瞭解程度、社會制度的瞭解程度、交友情況以及文化娛樂活動參與情況。

對於假設一，如表二，第一列數字所示，在控制了「性別」、「年齡」、「教育程度」及「來港時間」四個人口變數後，「電視使用程度」可以顯著預測「對社會制度瞭解程度」($\beta=.20, p<.001$)，且赴香港大陸學生電視使用程度越高，其對香港生活習慣的瞭解程度越高；報紙使用程度不可以顯著預測對香港生活習慣的瞭解程度($\beta=.01, p>.05$)；互聯網使用未能顯著預測對香港生活習慣的瞭解程度($\beta=.02, p>.05$)，假設一只得到部分支援。

對於假設二，如表二，第二列數字所示，在控制了「性別」、「年齡」、「教育程度」及「來港時間」四個人口變數後，「電視使用程度」可以顯著預測「對社會制度的瞭解程度」($\beta=.14, p<.01$)，即赴香港大陸大學生電視使用程度越高，其對香港社會制度的瞭解程度越高；「報紙使用程度」不可以顯著預測「對社會制度的瞭解程度」($\beta=.08, p>.05$)；「互聯網使用程度」也可以顯著預測「對社會制度的瞭解程度」($\beta=.11, p<.05$)，即赴香港大陸大學生互聯網使用程度越高，其對香港社會制度的瞭解程度越高。假設二只得到部分支援。

對於假設三，如表二，第三列數字所示，在控制了「性別」、「年齡」、「教育程度」及「來港時間」四個人口變數後，「電視使用程度」可以顯著預測對大陸生在香港的「交友情況」($\beta=.20, p<.001$)，即赴香港大陸大學生電視使用程度越高，其在香港的交友情況越好；「報紙使用程度」未能顯著預測大陸學生在香港的「交友情況」($\beta=.02, p>.05$)；「互聯網使用程度」也亦未能顯著預測大陸生在香港的「交友情況」($\beta=.06, p>.05$)，假設三只得到部分支援。

對於假設四，如表二，第四列數字所示，在控制了「性別」、「年齡」、「教育程度」及「來港時間」四個人口變數後，「電視使用程度」可以相當程度預測對大陸大學生在香港的「文化娛樂活動參與情況」($\beta=.28, p<.001$)，即赴香港大陸大學生電視使用程度越高，其在香港的文化娛樂活動參與情況越好；「報紙使用程度」未能顯著預測大陸生在香港的「文化娛樂活動參與情況」($\beta=.06, p>.05$)；「互聯網使用程度」可以顯著預測大陸生在香港的「文化娛樂活動參與情況」($\beta=.19, p<.001$)，即赴香港大陸大學生互聯網使用程度越高，其在香港的文化娛樂活動參與情況越好，假設四也只得到部分支援。

表二：媒體使用程度，對香港生活習慣瞭解程度、社會制度瞭解程度、交友情況以及參加文化娛樂活動情況之標準複迴歸分析

依變項 預測變項	對生活習慣瞭解程度	對社會制度瞭解程度	交友情況	文化活動參與情況
人口變數				
性別	.14**	-.02	.10*	.32***
年齡	.05	.01	-.07	.05
教育程度	-.05	-.04	-.09	-.04
來港時間	.22***	.12*	.26***	-.02
媒體使用程度				
電視使用程度	.20***	.14**	.20***	.28***
報紙使用程度	.01	.08	.02	.06
互聯網使用程度	.02	.11*	.06	.19***
Total Adjusted R^2	.12	.07	.15	.26

注：1.表內數字為標準化的迴歸係數（ β ）。

2.變項編碼方式：性別（1 = 男，2 = 女）；電視使用程度、報紙使用程度、互聯網使用程度（1 = 從未，2 = 很少，3 = 有時，4 = 經常）；對香港生活習慣的瞭解、社會制度的瞭解、交友情況以及參加文化娛樂活動情況（1 = 非常不符合，2 = 不符合，3 = 中立，4 = 符合，5 = 非常符合）。

3.* $p < .05$ ，** $p < .01$ ，*** $p < .001$

伍、討論

本次研究著眼於瞭解赴港大陸大學生媒體使用和文化適應的關係，我們將媒體使用分為電視、報紙及互聯網，並將文化適應分為三個方面，分別為對香港的文化瞭解程度以及在香港的社交及文化參與情況。我們的研究結果顯示，「文化適應程度」至少與一種媒體形式相關以及被顯著預測，具體來說：關於「對香港生活習慣

的瞭解程度」，資料結果表明，「電視使用程度」和「報紙使用程度」和大陸生「對生活習慣瞭解程度」顯著相關，但只有「電視使用程度」可以顯著預測「對生活習慣瞭解程度」，即赴香港大陸大學生電視使用程度越高，其對香港生活習慣的瞭解程度越高。可供解釋的主要原因有以下三點：一是大陸傳統媒體仍以電視傳播為主，大陸生來到香港後仍沿襲過去的媒體使用習慣；二是香港電視節目（如TVB 連續劇頻道）有關「香港生活」方面的內容特別豐富，生活氣息很濃；三是相對於報紙文字傳播，電視傳播直觀性強，能達到視聽合一的傳播效果。因此我們可以通過提高大陸生對電視媒體的使用程度，有助於他們對香港生活習慣的瞭解。

關於對香港「社會制度的瞭解程度」，我們發現「電視使用程度」、「報紙使用程度」和「互聯網使用程度」皆和大陸生「對香港社會制度瞭解程度」呈顯著相關，但只有「電視使用程度」和「互聯網使用程度」可以顯著預測對香港社會制度的瞭解程度，即赴香港大陸大學生電視和互聯網使用程度越高，其對香港社會制度的瞭解程度越高。由於互聯網在大陸發展雖然相對較晚，但發展速度較快，特別在年輕人群中上網率較高；再則有關「社會制度」方面的話題在互聯網上更容易發表，各種觀點也便於表達出來。因此大陸生在香港除電視外，互聯網使用程度的提高也可以有助於其對香港社會制度的瞭解程度。

關於香港大陸生的「交友情況」，我們發現「電視使用程度」和「報紙使用程度」與大陸生在香港交友情況呈顯著相關。其中，對於「交友情況」的瞭解，報紙雖有其獨特的優勢，但由於新的傳媒方式的出現，報紙的發行量和讀者人數在不斷下降。而基於大陸生在港留學生活的單調性，以及香港電視的強制性輸入（包括餐廳交通運輸），「電視使用程度」成為顯著預測對大陸生在香港「交友情況」的面項，即赴香港大陸大學生電視使用程度越高，其在香港的交友情況越活躍。

關於來香港的大陸大學生在香港的「文化娛樂活動參與情況」，經由資料分析我們發現「電視使用程度」、「報紙使用程度」和「互聯網使用程度」皆和大陸生在香港「文化娛樂活動參與情況」呈顯著相關，但只有「電視使用程度」和「互聯網使用程度」可以顯著預測對大陸生在香港的「文化娛樂活動參與情況」，即赴香港大陸大學生電視使用程度和互聯網使用程度越高，其在香港的文化娛樂活動參與情況越積極。

陸、結論

本文提出的四個假設均得到了部份有效支持，我們的研究結果支持了前人關於旅居群體的媒體使用對其適應旅居地的文化有著積極作用的論述。

但同時我們也發現，不同類型的媒體在文化適應中起著不同的作用。研究發現，不同類型的媒體使用與文化適應的四個具體維度呈現不同的相關性。

首先，大陸生使用互聯網越多，對香港社會制度越為瞭解。網絡上關於香港社會制度的資訊影響著大陸學生對香港的瞭解程度並幫助他們適應香港的文化。這也是由於網絡媒體特性決定的，互聯網使用者接觸大量資訊成為可能，並從「一對多」逐漸向「多對一」（如向一個中心地址發送電子郵件）和「多對多」（如新聞組，郵遞名錄等）的傳播模式轉變。網絡還賦予大眾以巨大的力量，使其可以看到以前難以獲得的資訊，而且還可以對自己接觸到的這些資訊加以控制(Severin & Tankard, 1997)。使用者可以任意選擇其需要和喜歡的資訊，並更傾向選擇那些和自己的態度相一致的訊息，選擇性接觸的現象在網絡媒體環境下更為多見。此外，傳播技術的發展，也使媒介之間的差別變得不像以前那樣明晰了(Severin & Tankard, 1997)。許多報紙和廣播都有自己的網站，網絡電視表現了電視和電腦融合的趨勢。因此，互聯網的作用，尤其在青年學生之間，有上升的趨勢。

至於對香港生活習慣和社會制度的瞭解程度，電視使用程度與這兩者有相關關係，這又再一次支持了以往學者的研究結果，相對於網絡媒體，電視對使用者的資訊輸入具有一定的強制性，公車捷運上的移動電視則更甚，放置受眾於封閉空間之下使得他們對資訊的接收程度比一般情況高。和瞭解程度有關的媒體內容一般為知識性內容，對受眾的相對強制性輸入可以加深他們對新環境的知識瞭解。

有趣的是，我們發現赴香港大陸大學生電視使用程度越高，其在香港的交友情況越好。電視對使用者的資訊強制性輸入使得大陸生不得不接觸自己並不熟悉的資訊，而不是僅僅依賴自己從前熟悉的有關大陸內容的媒體；但同時，對香港資訊的接觸使大陸生和香港朋友有更多可以分享的話題，說明他們更好地適應香港社會。

電視和互聯網對大陸學生在香港的文化娛樂活動參與情況方面皆有影響，一方面，電視使大陸學生對香港的文化娛樂活動有著更多知識性瞭解；另一方面，大陸學生可以根據自己的興趣用互聯網搜索需要的文化娛樂活動資訊。

最後，報紙對大陸文化適應的作用是超出我們預期的，因為按照大家的經驗年輕學生閱讀報紙的人數比例並不是很高。但是，報紙有其獨特的優點：如易於攜帶、隨時隨地地接受資訊等，而且報紙為受眾提供了大量有用的資訊，受眾對這些資訊還具有一定的選擇權利。香港的報業十分發達，多種報紙為大陸生提供了選擇多樣的機會；地鐵站等公共場所派發的免費報章也為讀者提供了豐富的資訊。

綜上，我們發現在年輕學生群體當中，雖然新媒體（互聯網）有相當大的影響力，但電視作為傳統媒體的重要形式之一，它的廣泛、普及、視聽合一性，以及大陸生對之已有的依賴感和用於消磨留學寂寞生活的需要均奠定了電視在文化適應上的重要地位。只是在功用上，傳統媒體和新媒體稍有區別：大體上來說，傳統媒體對受眾的知識瞭解、行為參與皆有一定作用，而新媒體對文化適應的貢獻主要集中在行為參與方面。

我們的研究對於文化適應的研究有一定的新意義。首先，以往關於文化適應的研究往往從人類學、社會學以及心理學的角度出發，研究旅居人群或新移民融入新社會中遇到的種種問題，而本研究是從傳播學的角度入手，通過研究媒體使用的多寡與文化適應程度的關係來探求旅居群體適應社會的途徑。因此本研究在一定程度上豐富了文化適應的理論研究。

當涉及旅居人群或新移民文化適應的研究時，以往學者往往選擇以跨國人群為研究目標，如 Hwang 與 He (1999) 研究媒介使用與旅美的中國移民文化適應關係，Yang(2004)對在美國的中國大學生進行的媒體使用與文化適應關係的調查，Kim(1978)關於旅美韓國移民的調查。但我們鮮少發現有關旅居香港的人群文化適應的研究。香港是一個國際化大都市，由於其種族的複雜性、文化的多元性而被看作是文化的熔爐，為文化適應這一課題提供了良好的研究背景。來港的大陸學生人數日益增長，已經成為香港社會一個特殊的群體，近年來數個大陸來港生自殺案件引起大眾的思考與關注（康殷，2010；明報，2011；譚靜，2011），這促使我們探尋其中的原因，試圖為大陸生更好地融入與適應香港社會尋求更多的可能性。我們的研究顯示，除了向周圍老師、朋友及家長尋求幫助之外，大陸生還可以通過自身的努力，比如主動從媒體獲取有用資訊、借助媒體這一有效工具來減少「文化休克」帶來的消極影響。同時，我們的研究以香港這個特殊的東西交匯的城市為背景，也豐富了文化適應理論的應用(DeFleur & Cho, 1957; Hwang & He, 1999; Keshishian, 2000; Kim, 1977,1978,1988; Richmond, 1969)。

其次，過去學者在研究媒介類型對文化適應的影響時，大多發現電視媒體對旅

居人群或移民的影響較大，如 Kim(1978)在調查旅美韓國移民發現美國電視節目對其融入美國社會的影響。而隨著互聯網技術的普及，沒人否認「互聯網是一個大眾媒介」的論斷。互聯網的飛速發展改變著傳統媒介的傳播方式和大眾接受資訊的方式，尤其對於我們的研究對象——多為 20 歲到 30 歲之間的年輕學生群體，網絡媒介在他們的媒介生活中佔有重要份量。我們發現了互聯網對於學生群體融入異地文化有較為重大的影響，更適應新傳播技術背景下的文化適應主題。

此外，本研究是對學生群體進行較為系統的實證研究，結合文獻研究和實地調查背景，採用自編問卷的科學量化研究方式，從對香港生活習慣和社會制度的接受程度、瞭解程度，交友情況和文化娛樂活動的參與六個方面對大陸來港生的文化適應進行系統的探討。國內外一些關於文化適應的量表都是針對跨國的不同種族人群的文化適應情況而設計的，香港有其特殊性，因為大陸和香港雖然有很多文化差異，但是由於文化同出一源，仍享有一些共同的文化背景，因此我們根據香港的本地情況，結合幾個量表做了調整修改，從而設計出一份較適合香港本地情況的問卷。

此次研究亦存在一些局限：針對的主體為在校大學生，並未涉及其他非學生群體，後續研究可將研究對象的範圍加以擴展，使得研究結果更具推論能力。此外，社群網站的興起對學生適應能力的影響；不同媒介內容所帶來的不同效果；以及女性及未成年人，作為在港絕大多數大陸人群的媒體使用與文化適應情況等問題都值得深入研究(Chan, 2002; Chan, 2008; Fung, 2005)，亦具有重大實際意義。最後，文化適應的方式與階段是文化適應研究中較為重要的一環，但是由於我們無法控制來港學生初來時文化適應的過程變化，此次研究並未觸及文化適應中的時間過程，因此本次研究雖支持了大陸來港大學生的媒體使用與文化適應的相關性，但問卷的研究方法無法證明兩者的因果關係，未來的研究可考慮用重訪法(panel design)探究媒體使用在不同時間段（例如剛來與之後）對來港學生文化適應上的影響；當然如果時間與經費允許，亦可考慮跨文化研究，在全球化的大背景下，將此次研究的範圍擴展至其他文化或國家的地區間。

參考書目

- 〈大陸生撰文談留港辛酸〉（2010年8月10日）。《星島日報》，第A15版。
- 大學教育資助委員會（2010）。〈學生人數統計資料〉。上網日期：2010年11月18日，取自 <http://cdcf.ugc.edu.hk/cdcf/searchStatisticReport.do>
- 白雲、白靜（2006）。〈香港文化的特點與形成的原因〉，《天津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9（6）：36-38。
- 何睦（2007）。〈香港回歸祖國10年來對兩地的影響分析〉，《內蒙古民族大學學報》，12（1）：564-566。
- 李蕙蘭（2002）。〈外籍學生新環境適應及日常傳播生活研究：以韓籍留學生為例〉，「中華傳播學會2002年會」，台北深坑。
- 林茂（2010年6月26日）。〈愁錢愁工作愁身分 大陸生社會邊緣掙扎〉，《明報》（香港），第A36版。
- 康殷（2010年8月24日）。〈港校大陸生的心理危機〉，《南方都市報》，第AⅡ版。
- 張勁梅（2008）。《西南少數民族大學生的文化適應研究》，西南民族大學博士論文。
- 教育局（2010年1月1日）。〈專上教育-院校〉。上網日期：2010年11月20日，取自 <http://www.edb.gov.hk/index.aspx?nodeID=7001&langno=2>
- 陳慧、車宏生、朱敏（2003）。〈跨文化適應影響因素研究評述〉。《心理科學進展》，11（6）：704-780。
- 黃希庭（2006）。〈壓力、應對與幸福進取者〉，《西南師範大學學報（人文社會科學版）》，32（3）：1-6。
- 黃葳威（2001年11月）。〈因特網對華人移民跨文化適應的影響：以加拿大溫哥華地區的中國大陸、香港移民為例〉，「2001年海峽兩岸傳播學術研討會」論文，無。
- 黃葳威（2008）。〈因特網對華人跨文化適應影響探討：以美國德州首府奧斯汀華人移民為例〉，《2008數字創世紀：e世代與多元文化國際學術實務研討會學術實務研討會論文集》，頁119-150。臺北：國立政治大學

數字文化行動研究室。

- 賈思育、胡娜 (2010 年 9 月 4 日)。〈通訊：香港高校迎新的溫馨與瘋狂〉，《中國新聞網》。上網日期：2010 年 12 月 4 日，取自 <http://www.chinanews.com.cn/ga/2010/09-04/2511804.shtml>
- 〈疑不適應港生活 大陸生 10 年 7 自殺〉 (2011 年 7 月 26 日)。《明報》，第 A17 版。
- 譚靜 (2011 年 8 月 3 日)。〈大陸生的困難〉，《市民日報》，第 P06 版。
- 龐樸 (1988)。《文化的民族性與時代性》。北京：和平出版社。
- Barnett, G. A., & McPhail, T. (1980). An examination of the relationship of United States television and Canadian identity.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Intercultural Relations*, 4, 219-232.
- Berry, J. W. (1980). Acculturation as varieties of adaptation. In A. M. Padilla (Ed.), *Acculturation: Theory, models and some new findings* (pp. 9-25). Boulder, CO: Westview.
- Berry, J. W. (1999). *Cross-cultural psychology: Research and application*.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Birman, D. (1994). Biculturalism and ethnic identity: An integrated model. *The society for the psychological study of ethnic minority issues*, 8(1): 9-11.
- Chan, R. M. C. (2002). *Acculturation of young new arrivals from mainland China to Hong Kong*. Unpublished doctoral dissertation, The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Hong Kong.
- Chan, T. (2008). *Exploring the acculturation of young new arrivals in Hong Kong via the reconstruction of life space: An application of Lewinian field theory*. Unpublished doctoral dissertation, The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Hong Kong.
- Cheung, K. M. (1996). Cultural adjustment and differential acculturation among Chinese new immigrant families in the United States. In S. Lau (Ed.), *Growing up the Chinese way: Chinese child and adolescent development*. Hong Kong: Chinese University Press.
- Cuellar, I., Arnold, B., & Maldonado, R. (1995). Acculturation rating scale for Mexican Americans-2: A revision of the original ARSMA scale. *Hispanic Journal of Behavioral Sciences*, 17(3): 275-304.
- Cuellar, I., Harris, L. C., & Jasso, R. (1980). An acculturation scale for Mexican American normal and clinical populations. *Hispanic Journal of Behavioral*

- Sciences*, 2, 199-217.
- DeFleur, M., & Cho, C. (1957). Assimilation of Japanese-born women in an American city. *Social Problems*, 4, 244-257.
- Doornink, W., & Jin, M. (1988). Television viewing and acculturation of Korean immigrants. *Amerasia Journal*, 14(1), 79-92.
- Fan, C. D. (1990). *Acculturation mode, consistency, and adjustment of Hong Kong Chinese immigrants in Toronto*. Canada, Ontario: University of Windsor (UMI Dissertation Services).
- Fung, W. W. (2005). *A Study of acculturation, coping and psychological well-being of new immigrant women from mainland China*. Unpublished doctoral dissertation, Th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Hong Kong.
- Ghuman, P. A. S. (2000). Acculturation of South Asian adolescents in Australia, *British Journal of Educational Psychology*, 70, 305-316.
- Graves, T. (1967). Acculturation, access and alcohol in a tri-ethnic community. *American Anthropologist*, 69, 306-321.
- Gudykunst, W., & Kim, Y. Y. (1997). *Communicating with strangers: An approach to 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on*. New York: McGraw-Hill.
- Hofstede, G. (1980). *Culture's consequences*. Beverly Hills, CA: Sage.
- Hofstede, G. (1983). Dimensions of national cultures in fifty countries and three regions. In J. B. Deregowski, S. Dziurawiec & R. C. Annis (Eds.), *Expectations in cross-cultural psychology* (pp. 335-355). Lisse, The Netherlands: Swets & Zeitlinger.
- Hofstede, G. (1984). The cultural relativity of the quality of life concept. *Academy of Management Review*, 9, 389-398.
- Hofstede, G. (1997). *Cultures and organizations: Software of the mind* (Rev. ed.). New York: McGraw-Hill.
- Hofstede, G. (2001). *Culture's consequences: Comparing values, behaviors, institutions, and organizations across nations* (2nd ed.). Thousand Oaks, CA: Sage.
- Hwang, B. H., & He, Z. (1999). Media uses and acculturation among Chinese immigrants in the USA: A uses and gratifications approach. *International Communication Gazette*, 61 (1), 5-22.
- Keshishian, F. (2000). Acculturation, communication, and the US mass media: The experience of an Iranian immigrant. *The Howard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 11, 93-106.

- Kim, Y. Y. (1977). *Communication patterns of foreign immigrants in the process of acculturation*. Unpublished doctoral dissertation, Northwestern University, Illinois.
- Kim, Y. Y. (1978). A communication approach to acculturation processes: Korean immigrants in Chicago.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Intercultural Relations*, 2, 197-224.
- Kim, Y. Y. (1988). *Communication and cross-cultural adaptation: An integrative theory*. Clevedon, UK: Multilingual Matters.
- Kim, C., Laroche, M., & Joy, A. (1990). An empirical study of ethnicity on consumption patterns in a bicultural environment. In M. E. Goldberg, G. Gorn & R. Pollay (Eds.), *Advances in Consumer Research* (pp. 839-846). Ann Arbor, MI: Association for Consumer Research.
- Lin, J-H., Peng, W., Kim, M., Kim, S., & LaRose, R. (2012). Social networking and adjustments among international students. *New Media and Society*, 14(3), 421-440.
- McLuhan, M., & Fiore, Q. (1968). *War and peace in the global village*. New York: Bantam.
- Miglietta, A., & Tartaglia, S. (2008). The Influence of length of stay, linguistic competence, and media exposure in immigrants' adaptation. *Cross-Cultural Research*, 43, 46-61.
- Miller, G. R. (1982). A neglected connection: Mass media exposure and interpersonal communication competency. In G. Gumpert & R. Cathcart (Eds.), *Intermedia: Interpersonal communication in a mediated world* (2nd ed., pp. 49-56).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Miller, G. R. (1982). A neglected connection: Mass media exposure and interpersonal communication competency. In G. Gumpert & R. Cathcart (Eds.), *Intermedia: Interpersonal communication in a mediated world* (2nd ed., pp. 49-56).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Miller, G. R. (1988). Media messages and information processing in interpersonal communication. In B. Ruben (Ed.), *Information and behavior* (Vol. 2). New Brunswick, NJ: Transaction.
- Nagata, K. (1969). *A statistical approach to the study of acculturation of an ethnic group based on communication-oriented variables: The case of Japanese Americans in Chicago*. Unpublished doctoral dissertation, University of Illinois- Urbana-Champaign, Illinois.
- Nelly, E., & Dafna, L. (2008). Paths of integration media uses in immigrant families:

- Torn between 'inward' and 'outward'. *International Communication Gazette*, 70, 21-40.
- O' Guinn, T. C., Lee, W. N., & Faber, R. J. (1986), Acculturation: The impact of divergent paths on buyer behavior. In R. J. Lutz (Ed.), *Advances in Consumer Research* (pp. 579-583). Provo, Utah: Association for Consumer Research.
- Penaloza, L. N. (1994). Border crossing: A critical ethnographic exploration of the consumer acculturation of Mexican Immigrants. *Journal of Consumer Research*, 21, 32-54.
- Reece, D., & Palmgreen, P. (2000). Coming to America: Need for acculturation and media use motives among Indian sojourners in the US.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Intercultural Relations*, 24, 807-824.
- Richmond, A. (1969). *Post-war immigrants in Canada*. Toronto: University of Toronto Press.
- Rogler, R., Linton, R., & Herskovits, M. J. (1936). Memorandum for the study of acculturation. *American Anthropologist*, 38, 149-152.
- Sam, D. L., & Berry, J. W. (1995). Acculturative stress among young immigrants in Norway. *Scandinavian Journal of Psychology*, 36, 10-24.
- Severin, W. J., & Tankard, J. W. (1997). *Communication theories: Origins, methods, and uses in the mass media* (4th ed.). New York: Longman.
- Taylor, E. (1871). *Primitive culture*. New York: J.P. Putnam's Sons.
- The difficult life that new arrivals from mainland experience in Hong Kong (2010, September 1). *Hong Kong China news agency*. Retrieved December 22, 2010, from <http://www.hkcna.hk/content/2010/0901/67171.shtml>
- Vivian, J. (2009). *The media of mass communication* (9th ed.). Boston, MA: Pearson Allyn and Bacon
- Ward, C., & Kennedy, A. (1999). The measurement of sociocultural adaptation. *International Journal Intercultural Relations*, 23(4), 659-677.
- Yang, C. (2004). Tuning in to fit in? Acculturation and media use among Chinese students in the United States. *Asian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 14(1), 81-94.

The use of mass media and acculturation among Chinese Mainland university students in Hong Kong

Cheng Yang*, Guo Jia**, Gao Luyangzi**,
Jiang Qiongxi**, Meng Chao**, Wang Yiqin**

Abstract

Although Hong Kong and the Mainland belong to the China, Hong Kong combines the traditional and western culture and distinguishes itself from the Mainland. This study, based on this interesting phenomenon, discuss the acculturation problem between two regions within the same country, also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mass media use and acculturation, and a detailed comparison between the new and traditional media effects on the acculturation is explored. Through the analysis of 447 effective questionnaires from the Mainland students in HK universities, this study finds that those students who have higher degrees of media use correspondingly can better acculturate from the cognitive and behavioral aspects: actively understand local social system and living habits; become positive in participating social interactions and cultural activities. The results also show that, compared with the Internet, the television as one of traditional media still has strong influence on the acculturation of Mainland students in HK.

Keywords: Mainland students, Acculturation, Hong Kong, Media use

* Cheng Yang, PhD student of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E-mail: ccyllove2010@gmail.com

** Other authors are journalists.

